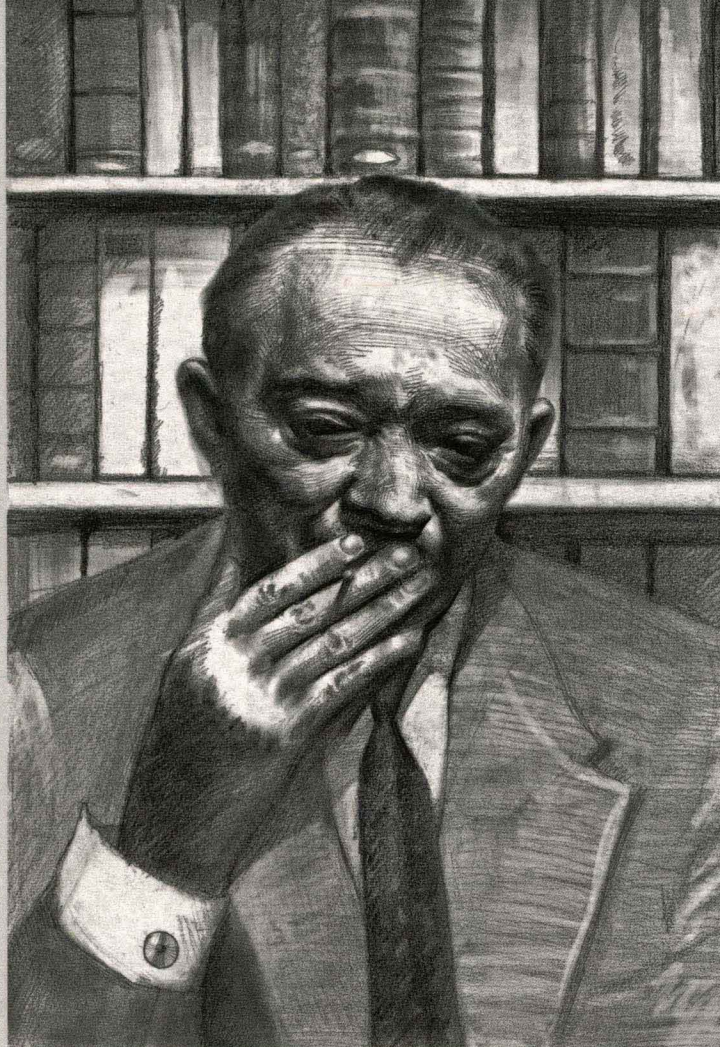


New York Intellectuals
纽约知识分子丛书



Philip Rhav

菲利普·拉夫

张瑞华 著

译林出版社

New York Intellectuals

纽约知识分子丛书

Philip Rhav

菲利普·拉夫

张瑞华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菲利普·拉夫 / 张瑞华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7
(纽约知识分子丛书)
ISBN 978-7-5447-3808-8

I. ①菲… II. ①张… III. ①拉夫, P. —文学思想—思想评论
IV. ①I71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82306号

书 名	菲利普·拉夫
作 者	张瑞华
责任编辑	许 昆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87千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808-8
定 价	29.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总 序

钱满素

“纽约知识分子”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起活跃在美国文坛的几十位知识分子，他们中不少是东欧犹太移民后裔，生活在纽约地区。他们关心社会，热衷政治，钻研文学，从事认真严肃的社会文化批评。欧文·豪在1968年的文章《纽约知识分子：实录与评判》中首次使用了这个称号。

他们早年信仰马克思主义，亲近美国共产党，憧憬伟大无产阶级文学的出现，激进政治与高雅文学的结合可以说是他们最初的理想。然而随着20世纪30年代国际时势的急速变化，他们开始表现出独立的姿态。作为一个群体，他们是在1937年底复刊的《党派评论》杂志抵制斯大林主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的。他们声称这是一份开放的文学月刊，不跟从任何意识形态，不规定任何创作技巧，以赞成民主争论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文化分析和评价的工具，立志为被扭曲的激进主义提供一种新的方向。《党派评论》的高格调开风气之先，影响了美国其他刊物，成为当时赫赫有名的思想类杂志，吸引着世界一流的作者。

纽约知识分子大致可分为两代几个年龄层次：第一代有威尔逊、悉尼·胡克、特里林、威廉·菲利普斯、拉夫等。比他们年轻的有卡津、索尔·贝娄、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查·赖特·米尔斯和小阿瑟·施莱辛格等。第二代有丹尼尔·贝尔、豪、欧文·克里斯托等，较年轻的还有苏珊·桑塔格等。显然，少了这群出类拔萃之辈，20世纪的美国文化将是另外一种面貌。

本丛书由于专业等原因，仅选择了在文学批评领域成就卓著的五位作为代表。其中威尔逊生于19世纪末，是资格最老的，现在仍然可能是他们中最重要的一位，五人中唯有他不是犹太人，而是有浓厚的新英格兰清教背景。在《党派评论》创刊前他已经颇有权威，是刊物首选的撰稿人之

一。特里林和拉夫都生于20世纪初，年龄相仿，但两人经历和性格却很不同。特里林生于美国，家庭虽为犹太移民，但已步入中产阶级，因此能在当时一般犹太移民青年很难进入的哥伦比亚大学接受良好教育，日后还成了哥大英语系的第一位犹太教授。他不那么政治化，主要成就在文学评论方面。相比之下，拉夫经历坎坷，自学成才，思想激进。他生于俄国，14岁才移民美国，正是他和菲利普斯两人创办了《党派评论》，并且以顽强的意志和敏锐的才智顶住各方压力，将它办成一份特立独行的左派刊物。卡津和豪又比他们年轻十来岁，卡津在美国文学上贡献很大，而豪是这群人中坚持左派政治最久的一位，后来自己还办了刊物《异议》。20世纪90年代末，这些人都已陆续告别这个世界，2003年《党派评论》的停刊无疑标志着曾经左右美国文坛的纽约知识分子群体已成历史。

纽约知识分子个个博学多才，自成一家，可谓各有特点。但只要略为深入，便能发现他们信念上风格上的很多共同之处，正是这些相对持久的共性使这个群体对内具有凝聚力，对外具有吸引力。

首先是他们的世界主义。他们虽然多为犹太人，但犹太性或种族性并不是他们关注的中心，他们的立场是世界主义的，也许这正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吸引他们的原因。他们思想开放，反对教条，主张文化的多元，力图从人类的大视角来思考问题，而不囿于彰显本族的文化。

其次是他们公共知识分子的特点。他们关注社会问题，富于政治激情，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虽然不可能一贯正确，但从不媚俗或盲从权威。由于他们始终保持批判性思维，故常能发挥社会良心的作用。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们的社会文化评论总是及时地出现在各种杂志刊物上，拥有大量读者，影响社会舆论。

第三是他们对人类优秀文化的继承。他们大都文学造诣很高，谙熟西方文学文化，尊重并维护西方文明的优秀传统，特别是人文主义精神这一光辉遗产。同时，他们又善于创新，在对美国文明和美国文学的梳理总结上尤为突出。现如今有人会说他们的文学批评缺乏理论和体系，但他们本

来就不追求这些形式。他们的文章清晰典雅，形成特定的品位和风度，本身就给读者一种文学的审美享受。这样的评论无公式理论可套，凭的是深厚的积淀和睿智，非平庸之辈拾人牙慧便能写就。

以纽约知识分子在当代美国文化的重要性而言，国内对他们的了解尚待深入。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的青年才俊们有志于此，在充分掌握资料后以十年磨一剑的严谨态度，几番增删修润，终于完成了这套研究丛书，奉献给有兴趣的读者。

目 录

前言	1
一 拉夫的生活经历	13
1. 漂泊不定的早期生活	15
2. 激进主义与《党派评论》	17
3. 《党派评论》内部的分歧	34
4. 个人感情生活	42
5. 20世纪50年代逐渐“进入”美国	48
6. 20世纪60年代的沉默与“再生”	56
7. 波士顿的最后几年	68
二 拉夫与《党派评论》	75
1. 《党派评论》的编辑宗旨	78
2. 《党派评论》的编辑原则	88
3. 《党派评论》的机构化建设	93
4. 《党派评论》的经济来源	101
三 拉夫的政治思想	107
1. 激进主义的思想基础	109
2.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117
2.1 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119
2.2 文学的现代主义运动	124
3. 共产主义的堕落与蜕变	136
3.1 反斯大林主义	136
3.2 战后的反共主义	142

四 拉夫的文学思想	149
1. 批评与批评“理论”	154
1.1 批评与批评的目的	154
1.2 批评方法	157
1.3 批评对象与批评手段	159
1.4 批评的基本原则	163
2. 创造性矛盾: 对欧洲现代主义作家的批评	168
3. 经验与思想的对立: 美国文学批评之一	184
4. “第六感”与“时代潮流”: 美国文学批评之二	193
4.1 自然主义	194
4.2 无产阶级文学	198
4.3 对神话—象征的猎取	200
4.4 形式主义的新批评	206
5. 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品质	207
五 结语	219
注释	225
参考书目	246
主要译名英汉对照表	249
菲利普·拉夫大事年表	255
后记	257



前言

在美国知识分子历史中，纽约知识分子赫然在目。作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无疑是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间活跃于美国知识分子舞台上的一支强劲而名字响亮的队伍。尽管公共知识分子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人们对他们的关注却始终存在。1987年，拉塞尔·雅各比以启示录式的书名、怀旧的口吻，出版了《最后的知识分子》一书。在书中，雅各比抛出了纽约知识分子不仅是美国最伟大的公共思想家，也是最后的知识分子的断言。雅各比通过对当今美国知识分子现状的分析，指出如今占据知识界的已不再是从前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是各类各派学术专家，即所谓的“私人”知识分子；雅各比叹息现在“有上千名激进的社会学家，但没有米尔斯；有三百名好斗的文艺理论家，但没有威尔逊”。¹该书一出版就激起了评论界的激烈论辩，但不久之后大家都趋于认同雅各比的观点：就美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公共知识分子的确已不复存在。²

人们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普遍认识几乎都与《党派评论》周围的社会文化批评家，如菲利普·拉夫、埃德蒙·威尔逊、莱昂内尔·特里林、艾尔弗雷德·卡津、欧文·豪、丹尼尔·贝尔有关。他们也是纽约知识分子这个诺曼·波德霍雷茨所谓的“家族”的三代成员的代表人物。当初面临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崩溃，这些知识分子深受激进主义思想的吸引，纷纷加入共产主义组织，探寻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可能。1936年的莫斯科审判使他们大受震撼，随后成为揭露斯大林极权统治以及苏联真相的坚定的反斯大林主义者。从此，他们开始偏离大多数左派分子，拒绝无产阶级艺术，在反对多种形式的斯大林主义的同时，倡导文学的现代主义，成为“反对中产阶级市侩势力，在政治思想与文学实验上高举欧洲标准旗帜的人士”。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来临使他们在美国该不该参加战争的问题上产生分歧，但无论他们对美国的看法有多么不同，战后时局的变化都使他们在调整自己的政治倾向时，“一方面为美国政府提议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又保持对美国社会秩序的批评态度”。他们相信胡克的论断，“如今……共产主义是对人类自由的最大威胁”，⁴

然而，尽管他们认同麦卡锡的共产主义威胁论，他们还是普遍反对麦卡锡迫害共产主义者的极端行为。20世纪60年代，随着美国社会进一步朝有利于知识分子的方向发展，再加上个人旨趣以及志向的不同，纽约知识分子这个“家族”开始分崩离析，越战可能是他们最后一次作为一个统一的“家族”对外说话，之后尽管他们继续在美国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已全然失去往日的内部和谐与统一。

如今，这个主要由作家、政治理论家、社会文化批评家组成的“家族”中老一代成员均已作古，年轻的一代也不再年轻。随着《党派评论》于2003年4月停刊以及九十四岁高龄的威廉·菲利普斯于2002年9月离世，纽约知识分子已成历史，但他们所留下的文学历史批评巨著、所经历的辉煌以及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无疑是美国文化历史上的宝贵遗产。正如欧文·豪与一位文化史学家所总结的：他们在文学上“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对这个国家来说，几乎是陌生的创作风格：全球性的、博学的且经常富含争辩的”；在政治上，“在将近三十年间他们代表了美国知识分子的核心，既作为国家之声音，又作为国家之良知”。⁵

如此重要的政治文化地位无论如何都离不开他们的“家族”舆论工具——《党派评论》。自杂志诞生之日起，尤其是自1937年复刊之后，《党派评论》就一直是他们的机构刊物，帮助确立了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及影响力。它既是“美国知识分子群体的家庭喉舌”，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甚至有可能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小型刊物”。⁶当然，《党派评论》的成就离不开杂志的思想内容，尤其是杂志对于文学与政治的关注、它所展现的那个历史时期的经验模式以及它对知识分子的普遍关怀，也离不开两位创始人——菲利普·拉夫与威廉·菲利普斯，尤其是拉夫的贡献。拉夫是公认的杂志的核心，他起着既是总指挥又是战略家的作用；他领导杂志就像指挥战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的编辑个性是压倒一切的；而与拉夫相比，菲利普斯起的是领班与裁判的作用。詹姆斯·法雷尔戏称两人的结合是“内容与形式”的结合。

拉夫个性强悍、善于思辨、言语尖锐。对他的评说总是离不开他一手创办的杂志——《党派评论》。因此，美国知识分子、纽约知识分子、《党派评论》、拉夫，它们总是锁链一般相互联结着、相互作用着。如果我们把美国知识分子比作一棵大树，那么纽约知识分子、《党派评论》便是这棵大树上的枝干与枝杈，而拉夫则是枝杈上的枝杈。这或许是个不太贴切的比喻，但本书的目的就是想借助美国知识分子这棵“大树”及相关的社会历史语境，探讨拉夫这枝“树杈”：它是如何成长起来的？长什么样子？又是如何“一枝独秀”乃至“独树一帜”的？当然，本书借助这样一个语境，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原因，那就是：尽管拉夫给读者留下了不少优秀的，乃至一流的政治、文学批评文章，但他几乎从来不说自己以及自己的生活，以至于我们对他个人的了解只能依靠别人对他的评说。然而，令人非常遗憾的是，就是这类评说也十分有限，因为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他的个人生活也知之甚少。他们普遍的印象是：拉夫对别人津津乐道，对自己却总是三缄其口。“他总是神秘秘密，几乎不为人所知。”⁷尽管这样，拉夫的编辑思想、政治思想以及文学思想还是非常透明、非常清晰的。

与其他纽约知识分子一样，拉夫早期深受激进主义的影响，相信马克思主义既是他们行动的指南，又是他们政治、文学思想的哲学基础。在激进气氛热烈的20世纪30年代，拉夫加入共产党，之后又不折不扣地是一位热情高涨的革命者。1934年的《党派评论》无疑是这种激进革命热情的产物。但是，赋予《党派评论》地位的却绝不是它对时代潮流的顺应，而在很大程度上，与拉夫一样，是对时代潮流的反对或者说是抵制。回顾《党派评论》的历史，尽管《党派评论》初刊时是共产党旗下的革命刊物，但第二年，拉夫就敏感地发现无产阶级文学有问题，例如：共产党对文学的操纵、文学质量的普遍下降、批评的党性化倾向，等等。第三年，再加上财政问题以及共产政策的转向，《党派评论》宣布停刊。莫斯科审判坚定了拉夫与共产党脱离的决心，使他毅然走上反

斯大林主义的道路。因此，1937年复刊时，拉夫坚持《党派评论》与任何党派和党性分离，杂志的关注中心从无产阶级转向了知识分子，从高尔基与反叛诗人转向了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T.S.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等。这种编辑思想与立场深深吸引了一大批具有类似倾向的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数是犹太知识分子，且很快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有人将这个弥漫着犹太气氛的圈子称作美国的“布卢姆斯伯里团体”。威廉·巴勒特曾提到，他在那些犹太知识分子中间几乎忘记了自己根本就不是个犹太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随着知识分子对美国以及战争的态度逐渐分化，《党派评论》成为了论争美国该不该加入欧洲战争的前沿阵地。拉夫的态度从最初的不介入战争转变为“在某种意义上，这场战争便是我们的战争”。这种态度的转变使德怀特·麦克唐纳等一些坚决的反战成员离开《党派评论》。20世纪50年代，拉夫引领《党派评论》率先揭露了苏联共产主义的极权性质。尽管在对待麦卡锡极端迫害共产主义者的问题上，《党派评论》没有成为批评麦卡锡主义的领头羊，但拉夫本人还是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对麦卡锡的谴责。除了政治上的成就，或许《党派评论》最大的成就在于它发现并培养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作家与批评家，他们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有：索尔·贝娄、苏珊·桑塔格、莱昂内尔·特里林、玛丽·麦卡锡、欧文·豪、艾尔弗雷德·卡津、德怀特·麦克唐纳、迈耶·夏皮罗、克莱门特·格林伯格、哈罗德·罗森堡等。据欧文·豪说，《党派评论》“不仅帮助创立了美国文学中的新流派，即城市‘疏离’小说以及犹太小说，而且还帮助形成了美国文学批评中的独特流派，即所谓的纽约社会批评家”。⁸当然，《党派评论》能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也离不开这些作家与批评家的贡献。

在那群个性迥异、成就卓著的纽约知识分子中，拉夫是位非常特殊的人物。拉夫早年辗转数国，饱尝生活的艰辛，因此除了20世纪50年代在政治上沉默了一段时间外，拉夫基本上一直是位共产主义者。他留

下的政治文章是他所经历的共产主义历程的最好体现,其中包括:20世纪30年代在《新群众》、《工人日报》、《反叛诗人》等共产主义杂志上发表的宣扬共产主义、无产阶级文学的、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的文章;20世纪30年代末与40年代初对与共产主义相对的斯大林主义的揭露与批评;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对共产主义成为一种实际的政治教条的质疑;以及最后几年他向20世纪30年代的激进马克思主义的回归等。这些文章体现了拉夫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的政治使命感与责任感:大萧条之前,他着意向美国人介绍马克思、列宁;莫斯科审判之后,介绍斯大林、托洛茨基,介绍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堕落以及斯大林主义的真相;之后,介绍凯斯特勒、马尔罗、萨特等一些欧洲激进知识分子,同时观照美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意识,提醒战后美国知识分子注意普遍的“资产阶级化”倾向。事实上,拉夫的这些思想都得到了延伸,成了《党派评论》的部分政治使命。

然而,拉夫毕竟是位热爱文学的文学批评家,他首要关心的还是政治世界中文学的存在。20世纪40和50年代是拉夫的政治保守时期,但却是他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最繁荣时期。随着激进主义逐渐消退,拉夫对文学的兴趣越来越浓。他的批评视野基本上落在对现代美国文学、欧洲现代主义作家的阐释以及对时代潮流,例如新批评、形式主义、宗教回归、神话—象征崇拜等的反击上。那段时间,拉夫创作出了一批极富洞察力与思辨性的批评作品。这些,再加上后期的一些作品,具体体现了拉夫所一贯坚持的批评思想与批评原则。

拉夫头脑清醒、思想具体、道德意识强烈。他认为批评是周旋于生活与艺术间极具责任感的活动;批评家的职责是恢复文学事件中参与者的角色。可以说,拉夫的批评代表着一种道德姿态。拉夫提倡文学过程的自律,蔑视任何以意识形态评判作品的批评家,如马克斯韦尔·盖斯马、格兰维尔·希克斯、伯纳德·德·沃托等;但拉夫又不同于绝对“审美”的批评家,他还注重艺术的政治含义。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

之所以能在拉夫身上融合，主要是因为对拉夫来说，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的现代主义是对付绝望处境的两大激进力量。拉夫还寻找“有用的过去”，视历史为机会的区域，作家确立自我的重要因素。这种“第六感”赋予了拉夫辨别欧洲经典作家与美国作家的能力，使他能够与他的批评对象保持一定的距离，并能客观、公正地评说他们的功过、优劣。

拉夫的文学批评方法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他强调文学的社会决定因素以及艺术客体在时间维度中的存在，但拉夫同时又吸收了存在主义、心理分析、社会学中的一些概念。我们欣赏拉夫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能够恰到好处地运用这些现代批评资源，不囿于某一方法或技巧。

与他比较欧洲化的政治思想一致的是，拉夫的文学思想也非常欧洲化。在《党派评论》复刊之后，拉夫有感于美国文学的不足，曾号召进行“美国文学的欧洲化”。拉夫的这种文学的欧洲化思想是在并不丢弃本国特色的基础上提出的，拉夫坚持“美国文学的欧洲化”不是对欧洲文学的单纯模仿或再现，而是拓宽民族文化，给美国文化注入新的活力，使之更加国际化。这种文学前景具体要求美国文学能创造出一种在思想上是世界性的、在具体内涵上是民族性的文学，正像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所创造的那样。在拉夫的思想中，美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就像伦道夫·伯恩所言的不同种族的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关系。拉夫本人也是欧洲现代主义大师的仰慕者，其中最典型的人物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尽管拉夫与他无论在脾性上还是在观念上都差异甚大，但却发现了他对现代危机所作的种种思考及其作品中所蕴涵的多重矛盾冲突与对立差异。拉夫认为，在所有现代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与现代经历的关系最为密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无论是在人物塑造还是在经验与思想、生活与文学、传统与创新等一系列辩证关系的演绎方面，都蕴涵着“创造性矛盾”。“创造性矛盾”是拉夫批评思想中的最高文学价值的体现。以欧洲文学为参照，拉夫在阅读美国文学时发现美国

文学存在着严重的对立与分裂,即以纳撒尼尔·霍桑与亨利·詹姆斯为代表的“苍白脸”和以惠特曼与马克·吐温为代表的“红皮肤”两种传统之间的对立与分裂。然而拉夫又提出,尽管这两种传统之间存在着许多方面的对立,但两者在对于经验的态度上却存在着明显的共同之处。拉夫希望在美国生活得到深入的同时,美国文学中对经验的崇拜能在与思想的融合中减弱,美国文化能最终走出两极分裂的死胡同。

拉夫还对批评家提出了看法。他指出批评家永远不能成为任何偏见或狭隘的奴仆;他必须了解国家的传统偏见,必须以世界文学的最高标准审视作品。他既不能戴着任何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去评判作品,又不能将作家的意识形态等同于作品的意识形态。一位优秀的批评家应该能够判断什么是世界级的珍品,什么是民族层次上的优秀作品。他必须公正、客观、严谨、清醒,而且还需要道德意识、批评智慧、审美力、鉴赏力、评判力等多种才能。事实上,拉夫的批评就是他所坚持的这些才能与意识相结合的典范。如果我们相信卡津所言:拉夫“本质上是位辩论家,而不是作家……是知识分子司仪与主帅……是他那群激进知识分子的约翰逊博士”⁹,那么我们无疑是在低估乃至忽视拉夫的文学与批评才能。尽管拉夫一生没有留下任何宏篇巨著,但拉夫对美国文学中存在的严重分裂、对美国文学对经验的崇拜以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剖析与洞见不能不说是引人深思。

这位乌克兰出生,毕生致力于将全球意识带入美国的欧洲移民,与其他纽约知识分子一样梦想着在美国取得成功、得到承认,但他同时又是那群知识分子中最边缘的人物。在逐渐认识美国、接受美国,将它接纳为“我们的国家与我们的文化”,并于1957年进入美国布兰迪斯大学的整个过程中,拉夫似乎在,并且也想与美国、与自己达成妥协。然而,他最终还是无法妥协,在失去了抗击时代潮流的最后一个阵地——《现代时刻》之后,他彻底崩溃了。无论说他如威廉·巴勒特所言,“越是成功,就越是抨击给他带来成功的那个制度”,是位很不明智的顽固